

民族史

第一章 中华民族的起源

一、“有熊国”到底在何处

远古时代，在中国大地上，居住着许多不同的氏族和部落。根据现存的古书资料记载 原始社会发展到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社会生产特点的历史时期 中国境内已经出现有熊氏、有娲氏（即西陵氏）、方雷氏、彤鱼氏、有娥氏、夙沙氏、蜀山氏以及补遂、九黎等大小部落。部落之间经常进行着军事混战。

《战国策》卷三所载的“神农伐补遂”，《吕氏春秋·用民》所记的“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史记·五帝本纪》所述的“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等，就是这个时期部落之间战争的写照。而顺应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以战争的手段制止野蛮性的掠夺战争，建立国家制度，开创中华文明历史新纪元的，就是有熊部落军事领袖轩辕黄帝与行政领袖榆罔炎帝。

史载黄帝、炎帝为“少典之子”。自三国时蜀光禄大夫谯允南说了少典为“有熊国君”之后，对于“有熊”，有说是国名，有说是具体地名，也有说是黄帝都邑。因为皇甫谧认为有熊即河南新郑，所以他的认识就与历代典籍所载的“黄帝都于涿鹿”发生了冲突。于是，他就在一个“或”字上做开了文章：“黄帝都

涿鹿。或以为都涿鹿 迁有熊 或以为都有熊 迁涿鹿。'或来或去，矛盾始终未能得到解决。现代自图腾崇拜学说观点盛行后 又有人说‘有熊’是氏族名称 由此而断言黄帝是熊图腾崇拜之族 等等。

其实“有熊”既非氏族名称 亦非依图腾崇拜而得 因为黄帝、炎帝的族属所崇拜的图腾物为“龙”。龙的形貌是依“蛇”而有。黄帝与炎帝都不崇拜“熊”。严格地说，“有熊”亦不能算作国家名称，而只是一个部落名称。其名称所得，是依其部落所在之地有熊耳山脉而得其称。

图腾崇拜在中国的原始社会里，只存在于母系氏族历史时期，而且是一个氏族中有一种共同的图腾崇拜物，每个氏族都由此而得其名称。到了因私有制的产生而引发了氏族之间的掠夺性战争之后，为了增强战斗力而由几个氏族共同组成一个部落的时候，部落名称就不再依原氏族中的图腾崇拜物名为部落名了。这是因为依任何一个氏族所崇拜的图腾物名为这个部落的名称，都不能代表全部落中各氏族的人，也不会得到全部落的共同认可。这个时候及其以后的一段历史上，部落或部落方国，一般都是依部落所在地的高山、大河或都城之名为其名称。有熊部落也是因地处熊耳山脉周围而得称“有熊”的。

在中国“熊耳山”是很多的。那么 有熊部落所在地 亦即古史籍所载的“有熊国”其地域有多大 在现在的什么地方 对此，我们只要从史事记述、历史地名与位置的记载、遗址遗迹的调查、考古研究、文物发现和科学测定等，做一个综合性的考证，就可大体上得到一个确切的认识。

一、关于黄帝出生和居住地。既然史载黄帝、炎帝是“有熊国君少典之子”，那么黄帝出生与居住地自是有熊部落中心。

《史记·索隐》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之语云：“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皇甫谧此说是将先秦各家之说汇集一锅而炒，作了一个串联，而未分清正确与错误的说法。“长于姬水，因以为姓”是据《国语》所载晋大夫胥臣曰季为劝晋文公纳其侄媳而编造的一个“德不同就姓不同”的错误说词。黄帝时期虽已是父权制时期，但仍沿用母系氏族时期从母得姓、以别婚姻，而限制近亲婚配的习俗，并不是其姓姬就是因姬水而得。他也未曾长于姬水。黄帝之名轩辕，也非因居轩辕之丘而得，倒是轩辕之丘本名青丘，因其出生、居住、建都于此丘，便以其名命称此丘为“轩辕之丘”，亦称轩辕之台。“寿丘”是轩辕之丘的一个别号，那是因黄帝长寿，特别是传言其后代中出了个钱铿活了八百余岁，故称轩辕之丘为“寿丘”的。皇甫谧不明此因，故将生、居之处因名称不同而视作两个不同的地方。对此，证之以郭璞之说，《山海经》之载，便自然明白。郭璞在《山海经》关于“轩辕之丘”的注释中说：“黄帝居此丘，娶西陵氏女，因号轩辕丘。”《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山海经》各经之文是依山脉走向等为经纬，对中华大地名地地名、物产等作纵横交叉式的记述，因而各经经文可以互证。轩辕之丘的地理位置在灵山以北，穷山之南。

“我们依《海外西经》、《大荒西经》的经文记述，按‘肃慎之国’、‘白民之国’、‘北狄之国’的地望已知来确定‘灵山’、‘轩辕之

丘’的地望 证实灵山 即今河北省涿鹿县南之灵山，‘轩辕之丘’与‘轩辕之台’及《史记·五帝本纪》所载的‘涿鹿之阿’实为一地 都是指早在北魏之时就已颓废的古涿鹿城遗址。其地在今涿鹿县东南矾山镇三堡村北。^{〔1〕}曲辰：《轩辕黄帝史迹之谜》第135、136页 历代地理著作之载与《山海经》一致。如《魏土地记》称：“下洛城 今涿鹿城 东南六十里 有涿鹿城”；《水经注·漯水》道：“涿水出涿鹿山……东北流迳涿鹿县故城南，王莽所谓播陆也。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 留其民于涿鹿之阿 即于是也”；《括地志》言：“涿鹿故城在妫州怀戎县东南五十里 本黄帝所都也。”

轩辕之丘遗址 确如《山海经》所载 为方形。现残存夯土城墙三面 东城墙被修水库拆毁了一段 城墙残存高度在 5 至 10 米之间 底厚约 10 米 城内面积 25 万平方米有余 到处都是磨制石器及陶器残片，现未经发掘，但自然出土的文物极多。

所以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在原始社会部落分布图中将涿鹿标明为有熊部落中心，是深有见地的。

二、熊耳山周围的远古居民。黄帝与炎帝所在的部落之所以依地有熊耳山脉而得名曰“有熊氏”是因熊耳山脉所在的地域正是中华远古居民始终在此长期聚居、繁衍、发展 并且社会进步最快的一个中心区域有关，这就是桑乾河流域。

桑乾河流域是加里东、燕山、喜马拉雅等地质构造运动应力接合与转换地带 以桑干河谷为界 北面为阴山余支的熊耳山、燕山余支的海陀山以及大马群山等 南为恒山、太行山脉及其余支的小五台山、灵山、军都山等。因先后受来自不同方

向的加里东运动、燕山运动、喜马拉雅运动的应力所致，各山脉、河谷向着不同的方向褶皱、扭曲、隆起、断裂、下陷，这就造成了沿桑乾河及其支流壶流河、洋河等水系的串珠式山间断陷盆地，如怀安、张家口、宣化、龙关、赵川、阳原、蔚县、涿鹿、怀来等盆地和谷地。这些盆地在其形成过程中，又控制了本区域内的水系发育，形成了串珠式的古湖，如大同古湖、涿鹿古湖等。其中，熊耳山脉南缘的大同古湖，其水域占据了今河北省阳原县、蔚县以及山西省大同市、大同县、怀仁县、应县、山阴县、朔县、浑源县、广灵县的大部分地域，面积达 9000 多平方公里。

这种地质构造上的特殊单元，造成了独特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和地方性小气候，不仅给古生物的繁衍造成了一个良好的地理环境，使第三纪残留下来的长鼻三趾马、爪蹄兽和第四纪标准属的野牛、三门马、纳玛象、步氏大角鹿、巨骆驼、四不象鹿、板齿犀、鸵鸟、野马、野驴、野猪、羚羊、短耳兔、中国鬣狗、剑齿虎、多刺鱼、鲤鱼、蚌、螺等动物在此大量生存，而且为古猿向着古人类、现代人类的进化与发展提供了少有的优越条件，使得桑乾河流域成为中国原始居民从原始社会形态不断向前发展、进步，并最终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区域。在这方面，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们的发现、研究以及一致的认识，就是最充分的证明。

古人类及文化遗址有：

泥河湾遗址，发现于 1924 年，其地层距今 300 至 152 万年之间，是我国华北第四纪早更新世的标准地层，为全世界所少见。英国、德国学者先后进行过调查与发掘，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进行过发掘 裴文中、贾兰坡、刘东生、周明镇等以及欧洲、大洋洲的学者先后进行过调查,1979年联合国科教文组也曾到此考察。此遗址发现有大量哺乳类动物化石与石器,是寻找我国早期人类化石的重要地点。

小长梁遗址,是比元谋人更早的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旧石器早期人类遗址 距今 250 万年左右。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发掘中 获得石核、刮削器和制作石器的燧石等 800 余件 以及大量被丢弃的三趾马、羚羊、牛、鹿、犀虎、象等的残渣剩骨。地点在桑乾河南岸。

北京人,其化石发现地址在桑乾河下游的北京市房山县周口店北山洞中 距今 50 万到 23 万年。

许家窑人,其化石发现于桑乾河上游的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与河北省阳原县侯家窑之间 人顶骨、枕骨、上颌骨和白齿化石至少代表十几个男女老幼个体,距今为 10 万年左右。

峙峪人 遗址在桑乾河上游的山西省朔县峙峪村 为‘泥河湾层’西缘 共发现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礮等 15000 余件 距今约 2.8 万年左右。

山顶洞人 遗址在桑乾河下游周口店 距今 1.8 万年。

虎头梁遗址 在桑乾河北岸 分布为虎头梁、西水地、六马坊、七马坊等九个地点 背依熊耳山脉 石器类型很多 有大量细石器发现。其制造技术和类型与日本石器时代的遗物有很多共同之处。距今为 1 万多年以前。

以熊耳山脉为中心的桑乾河流域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化遗址的分布极为丰富,除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阳原县泥河湾所属遗址进行了调查和部分发掘,

1979年由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张家口地区博物馆共同组成的张家口考古队，对蔚县壶流河流域的筛子绦罗、庄窠、三关几个遗址发掘并报告外，其他如怀安、尚义、万全、宣化、崇礼、涿鹿、怀来等县的遗址都未发掘。仅依1978年张家口地区文物普查中按地表所见文物而言，属于仰韶文化遗址的有三关、三营、庄窠、蒋家梁等，属于龙山文化遗址的有马站、彭大崖、珠窝园、焦庄子、贾堡、筛子绦罗、大门沟、石咀子、西相广、高家屯等。古城址达40余处。

桑乾河流域的古文化遗址按已发现和发掘而显示，有着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有着前后时代很久的延续与继承性。如“三关遗址（代号YSG）的主要堆积为相当仰韶文化阶段的文化遗存。一些相当龙山文化阶段的灰坑直接叠压或打破上述文化遗存的地层和遗迹。在遗址的断崖上，尚见有青铜器时代或更晚的文化遗存……三关遗址发现这个时期的房屋基址6座，不在同一平面。房屋形制基本相同，皆为坐北朝南，平面呈扇面形的半地穴式建筑，面积一般在40平方米左右，其间距不等，最近者仅4米”（张家口考古队：《1979年蔚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收获》载《考古》1981年第2期）；二是细石器相当丰富，最早的发现于一万多年以前的虎头梁遗址群，“筛子绦罗出土的809件细石器竟占石器总数的64%。这便构成了这种遗存的一个鲜明特点”（同上）。正因为如此，尤玉柱和李壮伟在《从桑乾河流域几处遗址的发现看我国细石器文化的起源》一文中认为：“在桑乾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细石器文化遗址从老到新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他们更认为，桑乾河流域可能是东亚、北亚和北美广大地区石

叶系统细石器的发源地（引自王世民：《1980 年的中国考古研究》载《考古》1981 年第 3 期）。1980 年 11 月安志敏在应邀参加日本明治大学建校 100 周年和考古学研究室及考古陈列馆成立 30 周年纪念活动时所做的学术讲演中也说：“细石器的出现以华北为最早 不仅中国境内分布广泛 还影响到东北亚洲和西北美洲的广大地区 既见于许多不同的文化系统 而延续的年代又比较长 但它不同于以欧洲、北非和西亚为中心的几何形细石器传统，这是值得探索和具有世界意义的考古问题之一。”他还指出，细石器“盛行于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其后随着农业经济的兴起，黄河流域的细石器突然衰落下去 不过在整个新石器时代 如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都保留少量的细石器”（安志敏：《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载《考古》1981 年第 3 期）。

三、炎帝焚林垦荒的‘烈山’遗址。它在今涿鹿县城西南 12 公里的龙门山顶上。地处桑乾河南岸，中间是桑乾河穿越的朝阳寺山峡 山峡北面即是熊耳山脉的黄阳山。东南距轩辕之丘 27 公里 西北距泥河湾盆地 21 公里。其焚林垦荒之处为一山顶平地，周围石骨嶙峋 山顶有土田四百亩。登之 四垣齐密 隐如城郭 不知为万仞山巅”（清康熙八年版《保安州志·山川考》），今依山顶有田四百亩而称“四顷梁”其田仍为农民所耕种。梁下有“龙门叠翠”奇景 为涿鹿古八大景之一，今因修龙门水库而遭破坏。所以 古史载炎帝“兴于熊耳、龙门”是正确的。龙门山自炎帝焚林垦荒后 史载为“烈山”，至其子柱继而耕作 史籍记为“厉山”到了舜耕于此山时 史书又记为“历山”。其实 烈山、厉山、历山本为一山即龙门山。

炎帝，因其历史活动中的特殊原因和地位的改变，历代都不以帝王大礼禘祭，而只在一年四季的郊祀中祀以南郊。所以，炎帝焚林耕种之山建以舜庙，是历代帝王祭祀虞舜的地方。如北魏明元帝于神瑞二年（公元 415 年）六月“壬申，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至广宁（今涿鹿）登历山，祭舜庙”。孝文帝元宏于太和十六年（公元 492 年）二月“丁酉，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魏书·帝纪》）成为定制。

综上史事记载、地名记述、遗址遗迹、文物发现、考古研究与学者专家们的认识，证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桑乾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因地质构造上的原因，形成了中国古人类生存发展和进化上的一个重要区域。它的文化现象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东亚、北亚、北美广大地区的历史发展和文化面貌，都产生了深远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影响。

桑乾河流域的原始社会发展进步，在进入以畜牧渔猎经济生产为主阶段、以农耕经济生产为主要特点的两个历史时期，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细石器的产生、发展、演变就是明证。所谓细石器，是指以燧石打制、琢制的锋利尖状器、刮削器以及石刀之类细小器物，主要是用于宰杀动物、剥皮、切割等。所以，细石器的产生、发展、演变，正是原始人类社会中畜牧渔猎经济生产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古史籍所记载的黄帝、炎帝所属的有熊部落，其名称所得是依张家口以南、阳原县泥河湾盆地以北、涿鹿县以西的熊耳山脉而有。有熊部落领导中心所在地是轩辕之丘，亦即古涿鹿城。有熊部落的地域范围大体上为坝上高原以南、山西、河

北两省北部包括北京市在内的地方。有熊部落是早已定居和农业经济生产高度发展了的部落。

二、黄帝与炎帝的关系

为了介绍黄帝与炎帝其人其事，不能不谈一下黄帝与炎帝的关系。在这里 我先得作一个检讨 五年前我在《轩辕黄帝史迹之谜》一书中 只认为“黄、炎帝本为亲族兄弟”说贾谊关于黄帝与炎帝是亲兄弟的观点“为不确之论”。事实上倒是我错了，黄帝与炎帝确为亲兄弟，只不过是同父异母而已。

黄帝、炎帝之父为少典。《大戴礼·五帝德》引孔子之语云：“黄帝，少典之子也。”《史记·五帝本纪》所载与《大戴礼记》相同。《淮南子·天文训》高诱注：“炎帝，少典子也。”《国语·晋语》中所载晋大夫胥臣曰季劝晋文公纳其侄媳怀嬴为妻之际，将黄帝、炎帝因依从母为姓之俗造成的不同姓说成是“异德之故”并附会出什么“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因有姬、姜二姓之得是错误，但他说黄帝、炎帝之父为少典还是对的。三国时虞翻、唐固也说：“少典，黄帝、炎帝之父。”贾谊的“黄帝者，炎帝之兄”说法（见《贾子·益壤》）是正确的。少典，是有熊部落初立之际的军事首领。少典非其真实姓名，当是依“小有典章”而上的谥号，与“黄帝”、“炎帝”的称谓一样。

黄帝从其母附宝原姓姬，后依封公改姓公孙，名轩辕，是有熊部落中的军事领袖。“黄帝”之称，是谥号加职称而有军事领袖称“帝”。轩辕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故死后以其重视农业生产之功而谥之曰“黄”。这就是《史记·索隐》所说的轩辕“有

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炎帝从其母亲姓姜，名榆罔，是有熊部落中的行政领袖。行政领袖之职是依氏族族长一职沿袭而来，其职称曰“后”。有熊部落初立之时，其行政领袖大约亦还是由妇女所担任的，榆罔之任可能为一种男人夺权或女人在形势所逼之下的让位而造成。“炎帝”之称亦是依其生前曾在龙门山焚林垦荒之功而谥，焚林烧山，烈火炎上，故谥之为“炎”。古人以原始社会末期部落为“国”，自亦将其双头领导体制中的“帝”、“后”两巨头视为“国君”，或将公孙轩辕与姜榆罔并称作“二后”或通称之为“二帝”。这样，姜榆罔按谥号就称为“炎帝”了。因火焰色赤，史书也将其称之为“赤帝”。

所以，黄帝与炎帝，论私人之间的亲情关系为“兄弟”，按“工作”关系则为“同事”。正因为如此，当炎帝受到蚩尤攻伐，炎帝败北之际，黄帝就全力帮助炎帝而战蚩尤。而且黄帝战败蚩尤，是将蚩尤活捉后杀死；但后来黄帝在炎帝向他发起争权位的“阪泉之战”中战胜炎帝，非但没有杀死炎帝，反而在建立国家制度之后，封炎帝为“缙云”之官，让他到南方治理“一半”天下。

三、炎帝称之为“谜”

古史籍对炎帝的历史活动很少记述，但对炎帝的名、号之称，德行之谓，则是五花八门，在有关的解释上更是无奇不有。

在称谓方面：

一曰炎帝。《史记·五帝本纪》载：“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二曰赤帝。《逸周书·尝麦解》记：“蚩尤乃逐赤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惧，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三曰烈山氏。《国语·晋语》言：“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韦昭注云：“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礼·祭法》以烈山为厉山也。”由此，又称炎帝作“厉山氏”。

四曰缙云氏。《史记·五帝本纪》说：“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饭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集解》引贾逵语云：“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贾逵说缙云氏为姜姓是对的，但说是炎帝之苗裔则属于错误。太史公于此是将帝鸿氏（黄帝）、少皞氏（青阳）、颛顼氏（高阳）与缙云氏排比而述其各自的“不才子”的，所以，“缙云氏”系指炎帝显而易见。

五曰阪泉氏。《逸周书·史记解》云：“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叛之，阪泉以亡。”此引文中的“独鹿”即“涿鹿”，“亡”字指亡其政，而非亡炎帝自身性命。

六曰炎帝神农氏。《前汉书·古今人表》书：“炎帝神农氏”并注：“炎帝妃生黄帝”。

在德行方面：

《淮南子·天文训》曰：“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兵略训》又云：“炎帝为火灾，故黄帝禽之。”东汉的高诱注称：“炎帝，少典子也，以火德王天下。”《吕氏春秋·荡兵》说：“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左传·昭公十七年》记郯国国君朝于鲁昭公时，鲁昭公出于好奇，曾问及“少皞氏鸟名官，何故”

也？”郑子在解释中曾顺便提到过一句“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的话，于是，爱在解释古史事中搞一点穿凿附会的服虔灵感大发，便给炎帝搜肠刮肚地编造出一串笨拙而又可笑的官名来：“炎帝以火名官，春官为大火，夏官为鹵火，秋官为西火，冬官为北火，中官为中火……”（见《春秋左传》孔颖达《疏》引）至于那些个杂七杂八的书，编造起来，一个个都不像班固、服虔那么笨。如《太平御览》引《广异记》曰：“南方赤帝女，学道得仙，居南阳愕山桑树上，正月一日衔柴作巢，至十五日成。或作白鹊，或女人，赤帝见之悲恻，诱之不得，以火焚之，女即升天。”

上述关于炎帝名、号之称，德行、事迹之说中光怪陆离的说法所引，还是持一种严肃的态度作有选择的引录，假如将那些专谈神、仙、鬼、怪之类的书中所述、所记再引录一些，那就会使炎帝的形象彻底变成一个妖怪。其实，上引诸说之谜的根源，却原本是既平常又简单的一件事，即姜榆罔在未做有熊部落行政领袖之前，在龙门山头放了一把火，刀耕火种的一把火！

为什么实行刀耕火种？古代多山地区的农民，在播种前，常先伐去林木，烧去野草，以灰肥田。同时放火烧荒，也可免去耕种之中的杂草滋生。至于为什么炎帝不在平地而偏要到山头上去垦荒，这是因为有熊部落所居的桑干河流域中，凡盆地多为水占。即使是无水平川地带，也很容易被洪水淹没。炎帝烧山也不是他一个人，他作为有熊部落军事首领之子，自然是要带上一批人们去干的。只是在母权制向父权制转换那个时候，在姜榆罔有其父、兄支持而取得有熊部落行政首领之

权的时候，他在龙门山放这一把火烧出了 400 多亩良田，那就是作为政治资本的一件很大功劳了。也正因为如此，后来姜榆罔才依焚烧龙门山的具体事件为功，而被加上谥美之号了：烈火炎上，故谥称“炎帝”；火焰色赤，亦称“赤帝”。古农耕与渔猎生产之法，本身就是“烈山而焚，竭泽而渔”。烈字本以火势猛作解，又当功业卓著作释。如《国语·晋语》云：“君有烈名，臣无叛质。”古人不但自己爱给自己起很多名号，记述史事也爱给古人多起名号，所以就又将龙门山称做“烈山”，谓炎帝曰“烈山氏”。《礼记·祭法》在汇集古礼仪制度之时，又把“烈山”抄录成了“厉山”。于是，就有人在解释炎帝名号时说：“烈山氏，一作厉山氏。”这还算不错的。有人则以此而称炎帝为“烈山氏”，称其子柱为“厉山氏”了。轩辕黄帝虽然阪泉之战将与自己争权位搞分裂的弟弟打败，维护了有熊部落军事联盟的统一，但他在建立国家之制后，以云名而命称官职，还是将炎帝封为“缙云氏”。这又是“缙云氏”的由来。缙，就是赤色之帛，“缙云氏”一职的命称，大约也暗含有化干戈为玉帛的深意。在后世历代帝王们的国家祭祀大典中，特别是夏、商、周三代，去古史发生时间未远，知之也清，都不将炎帝列入五年一禘、三年一祭的重要国家祭典中，而只是在一年四季举行的将天神、地祇、人鬼、星辰、山川一览子祭祀的“郊祀”中，将炎帝祭于立夏之初的南郊，让他陪南方天神赤熛怒。这就是《淮南子·天文训》中“南方火也，其帝炎帝”之说的由来。至于《兵略训》中的“炎帝为火灾，故黄帝禽之”则属于穿凿附会。《吕氏春秋·荡兵》篇，重议论之理而不重求史实，其说“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在论述战争由来的道理上，是无

可挑剔的 但反过来用此去解释或研究黄帝、炎帝的具体历史活动 则会出差错。炎帝用火 这是事实 但他只是垦荒 他在同黄帝进行的阪泉之战中并没有用火。黄帝在战蚩尤中 望云而辨气象 用了指南车在大雾天作战以胜蚩尤 用了八卦阵封锁蚩尤逃跑的道路，用了蓄山洪而后掘坝放水冲毁蚩尤城的办法给蚩尤以重大打击 但在战炎帝中则没有用水 也根本没有用水的地理、自然客观条件。所以若据《吕氏春秋·荡兵》之论去研究黄帝、炎帝之间的战争 必生错说。因为古史记载了黄帝“有土德之瑞”人们又据炎帝用火的历史事实 说炎帝“有火德”本也不失历史的真实。但后世不仅要按五行说 偏要给历史上的帝王们各定出一种什么“德”来 帝王们也要为了给自己定出个什么“德”——是火？是水？是木？往往邀集大臣开一个高级会议来讨论一番。其实 这是历代统治者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惯用的一套形式主义的虚假把戏，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欺骗老百姓。后世偏有一些文人据此又去解释历史 岂能不出笑话 本节开始所列的炎帝名号之称及德行之说中 除了“阪泉氏”之称 是依炎帝被蚩尤打败逃回涿鹿 由黄帝让其在战蚩尤中久居阪泉以避兵锋而来 以及班固故意编造历史称“炎帝神农氏”之外 其余都是据一点历史事实层层加码 世代积累 又在加码、积累增加水分之后再行编造 穿凿 附会所演化出来的使人迷迷然、茫茫然的各种不同说词！